

哲学与文史

薛福成矿屯思想探微

赵国栋,刘 晗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薛福成是晚清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富国自强的客观需求、考旧知新的学术渊源与“裁厘兴屯”的思想嫁接,是薛福成矿屯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防为凯觎”的利权思想、“化冗为工”的节流思想、“矿地监护”的管理思想、自给自足的开源思想、“予民于利”的民生思想,构成其矿屯思想的基本内涵。薛福成矿屯思想尽管较为松散且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与洋务色彩,但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革新精神,具有一定的思想贡献,折射出一种文化自信,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薛福成;矿屯思想;历史评判;文化自信;现实启示

doi: 10.3969/j.issn.2096-2452.2021.06.011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452(2021)06-0074-07

薛福成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充当幕僚,之后出任知府等地方官,光绪十五年(1889)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丰富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薛福成思想的多元性、特殊性与时代性的特征。^①就矿屯思想而言,它兴起于近代的矿业改革思想,自晚清至民国为世人关注,而薛福成则是晚清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②他的矿屯思想尽管看似松散,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矿业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方面的内在关联。

从近代社会思想史研究出发,结合经济思想史

研究,以薛福成《筹洋刍议》为核心史料,我们试图梳理出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成因、基本内涵、演变脉络,进而对其略作评判,力图弥补学界有关薛福成矿屯思想研究的不足。矿屯思想既是薛福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涵盖了他对晚清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思考,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族文化自信与浓烈的家国情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及民生改善具有启示作用。

一、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生成

薛福成密切关注国内外矿业的发展局势,力主

收稿日期:2021-09-26

作者简介:赵国栋(1996—),男,山东泰安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

刘 晗(1994—),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编号:2020XKT293、2020XKT302)。

^①薛福成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包括薛福成的人口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近代化工商思想、中西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以下胪列为我们管见所及:周德丰、张娇《薛福成的文化视野与改革思想》,《南开学报》2013年第2期;王莲英《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想特色》,《兰台世界》2015年第31期;王冬、李军松《薛福成的“考旧知新”说及其现代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②在薛福成之前,王之春就已提出“防营开矿”的主张,但薛氏的矿屯思想更为系统而全面。此外,矿屯思想的专门研究,目前学界涉及较少,相关成果见刘长林《开矿与富国:时代变局下王之春的矿业思想解读》,《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但诸多相关问题该文未展开论述。

通过借鉴传统屯田的组织方式大力发展近代矿业,以“光辅中兴之业”^{[1]5a},形成矿业生产之风气。其矿屯思想的产生既是早期维新思想使然,亦是晚清特殊国情和初步工业化的必然。

1. 富国自强的客观需求

晚清中国灾荒连绵,政治腐化,社会动荡,财政状况日趋恶化。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矿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煤矿具有“火化之用”,五金诸矿具有“转移之用,器械之用”^{[2]31a}。薛福成认为“矿政不修”是近代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所以甲于地球者,恃煤铁也”^{[3]539},所以他十分强调、重视各色矿产的重要性。晚清中国尽管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科技人才、科学管理及市场开拓等,振兴矿业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

特殊的富国强民的历史背景催发了薛福成矿屯思想的产生。他追本溯源,认为矿政衰败起于明代统治者“以矿税为厚敛之端”,“有司因之苛派百姓”^{[2]31b},在此历史惯性的影响下,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因此,薛福成倡导矿产乃“天地之美利,国家之大利”^{[1]2b},呼吁消除前代矿业发展的种种弊端,主张“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4]。但囿于晚清窘迫的财政状况,凡洋务“须借资于外,以致得不偿失”^{[3]826}。他呼吁中国政府独立发展矿政,并以此开通实业风气,继而收利于矿。他提出,开办矿务除传统的官办与商办外,矿屯一法是发展矿业、趋利避害的重要途径之一。

薛福成的矿屯思想发轫于对晚清社会变革的思考,^①他试图结合洋务运动提出的“富国强民”口号,为晚清矿业复兴做出初步谋划,他的思想视域不仅仅限于矿业,而是将其扩展至商务、军事与民生等方面,从而将振兴矿业与强国富民的时代需求相联结。

2. “考旧知新”的内在动力

在薛氏的学术思想中,他一贯倡导“穷旧而知新”“新旧不可偏废”^{[3]698},他的矿屯思想亦主要根植于中国传统屯政制度,可以说,“考旧知新”成为薛福成矿屯思想生成的内在驱动力。

在“考旧”的意识下,薛氏详查了苏轼在徐州任知府时的采矿之法。当时的徐州民风彪悍,强力鸷忍,苏轼由此采取了多方举措,“籍其名于官,授以刀槩,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2]33b}通过以往的经验,苏轼认为兵民合一的方法,可以达致“奸猾破胆而不敢谋”^[5]的成效,薛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虽然其所倡导的屯政与化民为兵不同,但其本质仍然是将军事与生产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

在“考旧知新”方面,薛氏认为“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犹在不能守旧”,更新是以旧为基础的“渐进”,他以传统屯政思想为蓝本,发展了他的矿屯思想。面对实业改革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他大力呼吁:“宜变今以复古,宜变古以就今。”^{[2]47a}提出“不忘旧然后能自新”的论断。总体看来,薛福成的矿屯思想立足于新旧之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3. “裁厘兴屯”的思想嫁接

薛福成认为,厘金是基于时势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仅是“济变一时而已”,厘金作为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若长期运行,必将“法久弊生”,薛福成在此基础上提出“裁厘兴屯”的主张。^{[1]19a-21a}

他认为可将屯政所需经费“暂借厘金一岁”,屯政发展进入正轨后,则可以废除厘金。加入李鸿章幕府后,他对厘金的态度旋即发生了改变,^②但其早期的屯政思想仍得到保留。薛福成认为屯田为裕饷之术,“所以济转运之不足,而纾民力于无穷。”^[6]屯政可以作为一种开源节流的策略。伴随着洋务运动对矿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他大受草木与矿产同为“天地之美利”的启发,看到了新疆豫军与畿辅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2]32b}的现实,如此的历史场景之下,薛福成逐渐萌发了“去厘兴屯”而“以矿为屯”的思想主张。

薛福成立足于晚清时局、厘金弊端、传统屯政制度等现实背景,以“考旧知新”为思想原则,以“屯政”“去厘兴屯”为设计模式,试图推动晚清矿业改革。他提出的“去厘兴屯”主张乃为一种早期的维新变革思想,既与其矿屯思想密切关联,又在客观

^①学界对薛氏矿业思想的探讨多散见于对薛氏人口养民思想的研究中,如余德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解决晚清“人满为患”吗?——评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5期。

^②韩国学者申义植将薛福成厘金思想分为裁除厘金、保留厘金与免厘加税三个阶段。参见申义植《论薛福成关于厘金税的思想与对策》,《安徽史学》,1997年第2期。

上成为其矿屯思想生成的内在动因。

二、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基本内涵

薛福成的矿屯思想乃针对晚清“腠理之疾”而发,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有“祛数弊而收诸利”的功效。清代前中期,随着边陲驻军的增加,军队开办煤窑仍着眼于“以济柴薪”的需求,希冀解决“煤价渐至昂贵”的经济问题。至晚清时期,防营开矿则更重视护矿与边防,如李金镛在漠河“以矿为屯……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7]。薛福成的矿屯思想以矿业为主体,还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我们从利权、节流、管理、开源与民生五个方面略作梳理。

1. “防为觊觎”的利权思想

道光年间,英美等西方诸国对中国矿产已有相当的调查与了解,颇有觊觎之心。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西方诸国仅是试探性地请开矿厂,请购矿产。道光三十年(1850),英国公使请挖取台湾鸡笼山煤矿,未被清廷允许,同年又有洋船环伺于台湾海域,“欲求采购台湾鸡笼山煤炭,以备火轮船之用。”^[8]同治六年(1867),美人德爱礼、花马太以天津条约第九条为藉口,“准令美国民人前往内地各处游历”^[9],借机在山东平度“雇佣百余人进行试挖”,然而,清政府以“私开金矿实属有违和约”为由,将其查处封禁。

在“利权外溢”局势下,晚清政府意识到列强在域内开挖煤窑将导致“自然之利供彼贪婪”^{[10]34b},薛福成更敏锐地察觉到“迩来觊觎者多,势难久闭”的客观形势。晚清政府方面,官厂“购煤亦未闻缺乏,只虑异族垂涎”^{[11]348},顾此失彼,错失发展良机;西方列强方面,洋人开采“用度照常,势必折亏”。薛福成一语道破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煤事虽赔贴若干,必偿于他处。”^{[11]348}西方列强实乃以煤矿为突破口,扩大对中国的资源掠夺。

薛氏洞察到洋人对华矿产的觊夺之心,为达到“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1]24b}的目的,他疾呼“与其彼图而拒之,不若我自创之。”^{[11]348}而矿屯则不“示弱于邻敌”,预防西人对我国矿产资源的垂涎,更不失为收回利权的主动性策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薛福成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意识,可视其为晚清反对列强经济侵略的代表人物。

2. “化冗为工”的节流思想

薛福成认为,冗兵是晚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清政府面对“闽粤残寇”“群捻”“苗回”的潜在威胁,不得不扩张防营,但是每省防营“无事坐食”,已然流为冗兵。面对内忧外困的政治局势,清政府却不敢贸然尽裁之。薛福成痛惜地说道“养兵之费岁两千万,几耗天下岁入之半。”^{[1]13b}国内外混乱政局造成军费浩繁且愈演愈烈,以致演变为“病国病民”。

针对冗兵问题,薛福成主张以战力较弱的各省防营,“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2]33a}如此,既可维系庞大的国防力量,亦可消除勇丁“骚动闾阎”的潜在祸根。薛氏曾言“西人谓金银者,国家之根本,而兵士之精血也。”^{[11]401}他认为可以仿照豫军、淮军经理屯田“以裨军食”的模式,提倡勇丁开矿,将“无事坐食”且糜费巨饷的各省营兵,转为矿工以减少军费的支出,“其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2]32b-33a}总之,以军队开矿以自给自足,舒缓清政府愈发窘迫的财政压力,既可节省浩繁的兵费支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棘手的冗兵问题。

3. “矿地监护”的管理思想

清政府“任民采取”的政策及地方宗族势力对自然资源的把控,造成“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2]31b}的乱象。地方豪民“袭祖父余业,出赁雇募开挖,世世相守”^{[10]14a},或“作奸犯科,抗拒官吏”,甚至因私开矿坑而“相杀伤”,政府“严禁不能止”^[12]。法律缺失与管理不力,导致矿业资源开采愈发混乱。

薛福成认为,国家委弃矿产的政策使“玩法者欲起而攘之”,一旦开采矿井,往往“如蚁附膻,如蝇逐臭,竞往淘取,获利颇厚”^[13],此种混乱的管理体系导致矿业发展的失序。加之矿匪“往往聚众私掘,啸聚剽掠”,或以盗抢为生,荼毒民间,矿业发展由此逐渐走向停滞。面对“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硐”^{[2]31b}的情况,针对“矿徒易聚难散,小则争掠,大则啸聚”^[14]的特点,薛氏主张分屯各营而以兵慑之,如此,“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民自难循于法之外也。”^{[2]33a}总之,薛福成欲通过矿屯建立兵士护矿、采矿的运行模式,旨在根除百年矿乱的弊端,培育良好的矿业生产风

气。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亦是结合现实的考量。通过对矿业生产的有效监护,达到保境安民之目的。

4. 自给自足的开源思想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各色矿业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光绪元年(1875),洋煤进口量达到143279吨,光绪十年(1885)则达到263378吨。^①薛福成痛惜地说“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2]32a}这必然导致日后外国日富,中国日贫。

薛福成认为,“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2]32a}自给自足地发展矿业,可使“中国之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借以扭转中国矿业经济落后于他国的颓势。他看到开办矿厂“工费为大宗”,此时的清政府正值财政困乏之时,资本不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薛氏切实提出推行矿屯,“只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2]33a}从节省工本入手开采矿山,逐步减少矿产进口,继而逐渐形成自给自足的矿业生产模式。薛福成认为,若每省皆能开办一二矿山,那么“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3]866}。这既是开源聚财的需要,亦是扭转仰洋人鼻息、争取晚清财政独立的基本策略。

5. “予民于利”的民生思想

薛福成主张“天下要政莫先养民”^{[1]38a}。晚清人口增殖,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3]611}社会的人口承载能力趋于饱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亦加剧了中国传统产业的破产,导致“民生日蹙,失业日多”^[15]。传统营生已然无法满足人口增殖所带来的就业需求,不少失业者“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1]32a},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薛福成倡导以矿产滋养穷民,即以矿屯经营为主导,百姓随之附收小利。矿产运输所需的人力与淘炼所需的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2]33a}“造一炮台也,制一铁甲船也,动费千百万金,而金工、木工、石工、开矿之工、熔炼之工无不获利矣。”^{[3]697}如此予矿利于民,“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不生。”^{[1]3a}薛氏认为开矿与垦田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曾言若开一矿“仰食者不下数万人,或数千

人,果能养数万人,是不啻得十万亩良田也”^{[1]2b},如此不失为“扩民生计之明证”。既解决了矿产的“运送”“淘炼”等环节的劳动力问题,也减缓了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谋生压力,矿业的近代转型发展,普惠了大众。

三、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评判

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欲通过矿屯达到自富自强之目的。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拟对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共性、特点、贡献与局限略作考察。

1. 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共性与特殊性

矿屯思想并非薛氏一家独创,王之春、马建忠等人提出“矿屯”说,陈澹然阐述了“矿军”思想,康有为、谭嗣同提出“矿养军、军护矿”,李建德也主张以军开矿,这些思想家们的矿业主张不乏共性。

其一,矿屯可以节省兵费,舒缓财政压力。王之春提出“兵之口粮出于矿税,利于饷也”^{[16]23b},陈澹然认为,“惟屯军矿军之法,可以严拱卫而无筹饷之劳。”^{[17]1a-1b}李建德认为,国家“略微补助,亦可省十分七八”^[18],马建忠强调矿屯可“节养兵之费”^{[19]19b}。20世纪初,国内亦出现“以所得之矿利为兵饷,亦救急之一策”^[20]的思想观点。

其二,防止西人觊觎中国矿产,反侵略意识觉醒。陈澹然认为,“矿军”可“杜外夷觊觎之萌”^{[21]12a}。马建忠认为,通过仿古屯田之法试办矿屯,可达到“杜强邻之窥伺”之目的。谭嗣同亦主张“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处处皆兵”^[22]。李建德认为,如若在满蒙疆藏实行矿屯以防卫边疆,则“必不复有今日之险象”^[18]。

其三,“眼光向下”的民生思想。王之春认为,发展矿屯“利于穷民”“贫民受惠,利于日用也”^{[16]23b}。陈澹然主张以工代赈,认为“非假此以济其穷,不足以消隐患”^{[21]12a}。

其四,军工合一,舒缓兵匪祸乱。陈澹然认为,“矿丁皆可为兵,何忧为乱。”^{[21]12a}马建忠认为,矿徒“以佐屯军,既杜祸萌,且资众力”^{[19]19a}。李建德认为,矿屯之法使各省军营有恒产,如此“兵心益固”。

^①数据来源:(清)扬楷《光绪通商列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08-116页。黄炎培、庞瀚《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4页。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67页。

尚需指出的是,虽然上述矿屯主张不乏对民生的思考,然而薛福成却将国计与民生相连。他认为,“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不生;境内之财,不流溢于海外,而国家于是乎不贫。”^{[1]3a}相比之下,更凸显了他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

2. 薛氏矿屯思想的历史贡献

首先,薛氏是近代矿屯思想的集大成者。

虽然诸家在矿屯主张方面有相通之处,但薛福成最早且最全面地阐述了矿屯思想,为后来学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者,薛福成的矿屯思想是以矿业发展为内核,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他结合晚清复杂的国情民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矿业改革主张。

薛氏主张将近代公司的组织形式融入到矿屯经营之中。王恭寿在《中国创设海军议》^①中提出“矿屯与股分相表里”^[23]的主张,认为开矿失败之根源在于招股不善,需要“严追招股董事及委员”,应“请熟练者为之经理”,继而再用营兵进行开采,薛福成颇为赞同其“矿屯与公司股份法融而为一”的主张,认为公司股份之法,“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1]38b}后来的晚清学者虽然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如陈澹然将“矿军”比附于公司,“以应给恩饷为本,以营官为公司总办,哨弁为内外监理运售之人。”^{[17]5a}李建德倡导矿屯,“其法殆与兵制同。”但是他们的矿屯思想仍未超脱兵制之桎梏。相比之下,其他人的主张虽有公司组织的萌芽,但仍根植于封建军队,带有相当浓厚的保守色彩,而薛福成提倡的公司组成法则较为先进,其矿屯思想已然走出了以传统兵制为基础的窠臼。

其次,薛氏矿屯思想折射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宝贵的变法精神。

薛福成认为,裁撤边营“益示弱于邻敌”^{[2]32b},而矿屯则可“建威销萌”。在利权问题上,他疾呼开发矿产,“岂非收回利权之要道耶?”^{[3]689}由此可见薛福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后人提出“古有制屯以防冲突,今立矿屯以防分裂”^[20]的主张,鉴于清末民初满蒙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李建德亦声称,“边圉要地,非有重兵镇慑万不足以图

存。”^[18]这些主张可谓是对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发展与补充,薛氏在这方面的肇始之功不可忽视。

传统士人社会固有的保守性与封闭性,使变革与发展受到严重束缚。薛福成批判理学,“曰泥古,曰见小,曰责人,然非真理学也。”提出“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2]47b}的主张,这为其早期的维新变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薛氏倡导,“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2]47a}这既是薛福成对儒家思想实用性的阐发,给予早期维新活动以思想支撑,亦是对清流士人“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1]69b}的有力回击。面对晚清错综复杂的内外局势,后人评议“薛氏矿屯之议颇便推行,所举六利,亦皆切实有据,故后之论者多采其说”^[24]。总之,薛氏矿屯思想具有鲜明的变法精神,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多年积弊,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3. 薛福成矿屯思想的历史局限及其原因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矿业发展缓慢、体制腐败及列强巧取豪夺,使薛氏的矿屯思想缺乏推行的现实土壤。

近代中国矿业滥觞于洋务运动,道咸时期,“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为遥制。”^[25]矿权已然下移,但矿业发展仍然十分艰难。

相对于传统开采模式,矿业生产逐渐发生了近代性质的演变,然而近代矿业管理阶层的腐败导致产业体系衰微,乃至“中国矿政之大厄”,如基隆煤矿,“每个高级官员都可以派私人的‘代表’,在矿厂任冗职。”^{[26]589}国际方面,甲午战争后至1912年间,“列强为攫取矿权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及合同达42项之多。”^[27]更有甚者,西方列强“除去履行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商民所订办矿合同中载明的义务事项以外,对中国现行或将来颁行的公司和民事诉讼的法规,可以完全置之不理”^[28],中国矿业利权逐步丧失殆尽。最终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薛福成的矿屯思想失去了进一步推行的契机。

其次,从历史发展潮流看,工人阶级的产生为近代矿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却与矿屯的思想

^①《中国创设海军议》课题由薛福成所命,为上海格致书院夏季课题(参见光绪12年5月14日申报),此篇为薛福成取录格致书院,参见1887年1月16日申报第4943号第10页。

主张背道而驰。

晚清政府面对财政危机,将部分压力转移于下层人民,农民已然“悲惨万状”,加之帝国主义掠夺、商业贷款资本盘剥与地主阶级压榨的多重压迫,破产农民数量不断攀升,为近代工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近代雇佣工人约有91850—98060人,^[26]^[20]至1919年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人。^[29]矿屯之法固然缓解了工业成本的经济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近代)矿业开发需要大量资本,并能将手工业者改造成工人。^[30]然而,新式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带有传统色彩的矿屯经营,在本质上是相反相悖的,何况矿屯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政局安定与封建统治,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仍为封建主义所束缚。

此外,薛福成倡导的矿屯主要实行人烟稀少但资源丰裕的边陲地区,开矿士兵“远役遐荒”,生活艰苦备尝。如塔尔巴哈台煤窑矿兵,“不敷工作”甚至病故。漠河金矿的护矿兵,“每因不服水土疾病逃亡。”^[31]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未能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故其矿屯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

结语与思考

薛福成从国计民生出发,提出了带有近代性质的矿屯思想,并涉及军事、商务与民生等方面,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思想体系。其矿屯思想虽然带有浓厚的守旧色彩,却是早期维新派突破数百年理学藩篱的一种表现,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与革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化的自觉,对当今社会经济不乏启示作用。

首先,薛福成矿屯思想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

薛福成矿屯思想产生于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其思想发展的源动力。薛福成认为,“中国之民大抵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3]^[686]“考旧知新”、以旧为新无疑可以在民族精神低落之时,重振文化自信。有学者指出,这种深层次的爱国情怀和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历千年而弥新的中国传统学术。^①

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民族危

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薛福成在传统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变革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近代学人对晚清社会的思考,其强国富民的矿屯思想无疑立足于爱国主义情怀之上,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32]在新时代,我们应奉爱国主义思想为圭臬,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此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魂。

其次,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军队加速工业化进程,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1966年,在国家工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与三线建设背景下,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33]的煤炭工程部队应运而生,这支部队的成立旨在改善煤炭工业布局,加快煤炭工业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与薛氏的矿屯思想不谋而合,在其成立至撤销的17年间,已然成为一支建设新中国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三,为贫民提供就业,舒缓晚清人口增殖带来的社会矛盾,今日来看仍不乏借鉴意义。

薛福成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矿屯”与富民利民相得益彰,希望通过振兴矿业来救济贫民,广开就业之路,缓解因“户口蕃衍”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尽管新时代已然与晚清时期迥然不同,但其“养民”“厚民”的民生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就业需求仍是一大社会问题。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34]我们理应借鉴薛氏的矿屯思想,“联民情,定规制”,挖掘当地的资源优势,扩大后发展地区人民的“谋食之资”,带动乡村社区发展,将剩余人口转移至新兴产业,最终通过“殖财”与“养民”的双重路径,更好地实现新时代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的双赢局面。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作为晚清思想家,薛福成对守旧派封矿停产的主张进行了有力地反击,他打

^①参见郑师渠《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我们认为,若从广义层面看,洋务运动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已有萌芽。

破陈规教条,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主张“考旧知新”,力图借鉴西方公司组成法对中国矿业进行改革,虽然其矿屯思想还有瑕疵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清学人初步的文化自信,透视出早期维新派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思,对当今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树立起文化自信不乏启示。

参考文献:

- [1] 薛福成.庸庵文编[M].清光绪刻庸庵全集本.
- [2] 薛福成.筹洋刍议[M].清光绪十年(1884).
- [3] 蔡少卿.薛福成日记(下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 [4] 广智书局编辑部.三星使书牍(下册)[M].广智书局,光绪34年(1908):26.
- [5] 苏轼全集(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52.
- [6] 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2.
- [7] 吴汝纶.李文忠公奏稿[M].民国景金陵原刊本:20a.
-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000.
- [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矿务档.山东卷[M].1960:737.
- [10] 宝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M].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钞本.
- [11] 蔡少卿.薛福成日记(上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 [12] 张廷玉.明史(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1157.
- [13] 字林沪报[N].1891-12-14(3).
- [14] 孙和相,戴震.乾隆汾州府志[M].乾隆三十六年刻本:20b.
- [1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505.
- [16]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M].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刻本.
- [17] 陈澹然.京畿屯矿两军议[N].江西官报,1903(8).
- [18] 李建德.矿屯说[N].时报,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十四日(第2版).
- [19]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M].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 [20] 拟改设西藏行省策[N].新闻报,1906-02-13(01).
- [21] 陈澹然.权制[M].清光绪二十六年徐崇立刻本.
- [22] 谭嗣同.谭嗣同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408.
- [23] 接录中国创设海军议[N].申报(第4943号),1887-01-16(10).
- [24] 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哈佛燕京学社,1939:43.
- [25] 赵尔巽.清史稿[M].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166.
- [26]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27] 朱训.中国矿业史[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9.
- [28] 李思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3a.
- [29]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83.
- [30]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M].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4.
- [31] 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8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55.
- [32]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19(5):4-8.
- [33] 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编纂委员会.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志[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5:1.
- [34]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N].人民日报,2020-05-29(03).

(责任编辑:张明海)